本版编辑：兰文飞 版式设计：王 芳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8929017

深化“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 何中华

自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亦即“第二个结合”提出以来，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批相当丰硕的成果。这对于全面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实质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看，相关研究还是初步的，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就有赖于此项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一种突破，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自觉秉持“世界历史”视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相遇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这是一项具有前提性因而需要先行从事的准备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质阶段，带来了多重历史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世界历史”的崛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的范畴，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复制和再现，表征为全球性的基本关系。从后来的发展研究中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观点看，这也就是所谓“中心—边陲”关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建立。这些理论所采取的结构主义视角，更加凸显了这一关系在全球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对于劳资之间“零和博弈”关系的外溢和国际化，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就作过清晰的揭示：“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触及“世界历史”问题，例如在批判地叙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思想时说过，“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当然，马克思拒绝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视作绝对精神外化的唯心主义立场，而是把它理解为基于人类普遍交往这一实践活动而建构的现实过程。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设想，《资本论》的庞大写作计划一共包括六篇，最后两篇就是“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这两者虽不等于“世界历史”，却构成整个“世界历史”的经济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基于“世界历史”这一根基和视野展开的。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的产物，这个特定阶段正是通过作为人类普遍交往形式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而形成的。马克思所秉持的“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内在地要求我们把“第二个结合”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并根据这一特定历史语境来对其加以把握和阐释。

马克思说过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问题在于，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这种“需要”不能囿于单个国家内部来理解。只有从“世界历史”角度着眼，才能真正揭示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革命的实践诉求，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国家的传播提供了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成一种“实践能力的明证”（马克思语），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实质性的相遇。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自觉地提出并反思“第二个结合”的问题。

其次，坚持用“辩证逻辑”考察“第二个结合”何以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在理由和机制，进一步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

关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比喻的说法意味着“第二个结合”不是机械的“拼凑”和“加和”，不是一种简单的“集合”，不是“一袋马铃薯”（马克思语），而是类似于“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过程。关于“化学反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制”，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生命体”的角度看，这种“机制”的有机性就格外地凸显出来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说：“‘化学亲和力’如果包含在什么地方的话，无论如何就是包含在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这诚然是就自然界现象说的，但在文化领域类似的现象则表现出更大的丰富性和更充分的规定性。

只有辩证法才能以扬弃的方式超越“非此即彼”式的形而上学。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显然，“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我们若不能掌握“辩证逻辑”，是既无法接受也不能解释“第二个结合”这一文化事实的，更难以把握其背后的实质。

对“第二个结合”所作的研究，一开始是需要进行“同异之辨”的，这是一个无法跳跃的步骤，但不能就此止步，还必须进展到辩证逻辑的高度。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蒲鲁东时说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体现着现代与传统的紧张，那么我们不能像蒲鲁东那样试图通过去掉一个方面、保留另一个方面来解决，应该从两者相遇、经过冲突、彼此扬弃，进而“融合成一个新范畴”的角度，去考察其“辩证运动”的实质，以揭示这种“运动”的历史内涵、具体机制及其赖以实现的条件，阐明它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本土文化的接触、融会贯通是何以实现的。需要指出，“第二个结合”的研究唯有由此出发，才能从学理层面上克服那种抽象的、空洞的、超历史的判断，从逻辑上化解晚清以来就困扰着中国人的“古今中西之争”所造成的抵牾和吊诡。

最后，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着眼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促进对“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深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构成其重要标志。这归根到底离不开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文化特质。在文化意义上，“我”不成其为“我”就谈不上“主体性”，而“我”之为“我”最终取决于被我们所分享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释者和能动的实践者。按照解释学观点，正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的“前见”，乃是这种解释和运用所以可能的条件。作为“路径依赖”，它不仅预先制约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而且给出历史的约束条件。恩格斯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各个国家特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总是呈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其关键就在于正视中国的这些条件及其文化形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这已经为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彻底实现，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和成功探索。现代化的“中国式”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来自中国文化及其传统所蕴含的“基因”和“底色”。离开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就谈不上“中国式”或者“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正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最重要的历史内涵。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道路的筹划，这一规定性也无从彰显，不可能成为现实。就文化意义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谓是中国文化基因在新的历史基础上实现的一次“凤凰涅槃”。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规范了中国具体实际，这正是理论指导作用的体现和贯彻；另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通过能动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选择和建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中国，中国也成就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相互成就，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以凸显并日益巩固，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自觉建构。历史地看，这个过程是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实现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真正读懂并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取决于“世界历史”所决定的特定语境。但从文化基因层面上说，则不能不归因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原型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关系。由我们的文化及其传统实际建构的“期待视野”，正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之所以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这种“理解”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在解释学意义上发生的“视界融合”。马克思主义传入并运用于中国实际，作为一种适合具体国情的学说在中国的实现，历史地表征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一系列过程。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式。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对古老中国的拯救，也是中华民族以主体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目标的达成。只有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感，从而得以深化和拓展。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明理悟道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

□ 刘三宝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理论武装的内在规律，为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社会思潮多元激荡，网络文化良莠不齐，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塑造关键期，思想引领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代新征程，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既是时代赋予高校思政课的重大使命，也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的必然选择。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我们党历来强调把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上升到解决“总开关”问题的高度。毛泽东多次指出“理论武装”对于全党“思想觉醒”的重要性。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十四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方向问题决定育人性质，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育人工作若在政治方向上模糊摇摆，“为谁培养人”的答案就会走偏，立德树人的“德”也就失去了质的规定性。高校思政课必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只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凝聚青年，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贯穿系统化课堂教学、学理化阐释和实践浸润之中，才能使培养出来的人既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直接关系到把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不仅是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思政课赢得学生、实现铸魂育人的关键之举。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必须以理服人、以学育人、以道铸魂。一方面，坚定“四个自信”，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成功案例印证理论的真理性，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道理，从纷繁现象中把握本质，从短期波动中辨识大势，让青年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另一方面，推进教学改革，善于以小切口反映大格局、以小故事折射大道理，综合运用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多样化教学方法，推动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教学话语转化，以生动画面和通俗语言将高深理论拆解为可感可知的知识点。善用“大思政课”，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把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场景转化为鲜活教材，引导青年学生在真切感受思想伟力中增进理论认同。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的关键主体，学习好、研究好、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思政课教师责无旁贷。一方面，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思政课教师要自觉把教育家精神作为教书育人的行动指南和精神航标，践行“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根本要求，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以政理为引导，以学理为支撑，以事理为载体，锤炼教学硬功，实现从理论话语到教学话语、从学术体系到教材体系、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引领的有效转化。另一方面，坚持以思政课教学为核心的评价导向。贯彻落实“破五唯”的教育评价方针，防止“重科研轻教学、重形式轻实效、重指标轻育人”等不良倾向，通过评价制度改革，把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要求嵌入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轨道，使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成为教师的内在追求和制度激励。在此基础上，更加突出课堂教学质量、学生思想成长、价值认同度等关键指标，注重学生评价、同行评价与组织评价的有机结合，探索全过程、多维度的教学质量评估方式，引导思政课教师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把功夫下在课堂上。

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系统工程。唯有把握好“术”“学”“道”的统一，以真信笃行坚定信仰，以深厚学养支撑教学，以创新方法激活课堂，方能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论坛

发挥短视频对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作用

□ 杨 超

理论传播是以科学真理点燃亿万人民信仰之火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运用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方式开展宣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重要论述基于对舆论生态、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敏锐洞察，为做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指明了方向。新征程上，主动用好短视频这一新载体新渠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广泛深入抵达基层、浸润人心，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课题。

深刻认识短视频的理论传播价值。相较于传统文字读本、专题宣讲、长视频纪录片等传播载体，短视频以秒计时、以屏为界，拥有沉浸式画面、场景化叙事、人格化表达和社交化扩散等综合能力，是信息时代理论传播不可回避的重要阵地。它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可看可感的具体形象，把单向灌输改变为可评可转的双向互动，把人找信息推进为信息找人的精准分发。尤其是它嵌入亿万群众的通勤、休憩、等候等碎片化时间，成为日常生活的伴随性存在。当前，短视频拥有10亿量级的用户规模，意味着这已经是当代中国最具覆盖力的舆论场和最具渗透力的思想场。对这样的阵地，我们决不能固守原有思维漠然视之，决不能缺位失声甚至拱手让人。

理论宣传要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现在的年轻一代在碎片化、视觉化、互动化的信息环境中成长，他们对居高临下的说教天然疏离，对空泛的概念演绎缺乏耐心，但对真实的故事、具体的场景、可感的人格却保有强烈的共情。这种接受心理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偏好差异，而是媒介环境长期塑造的结果。短视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把理论从概念体系转化为体会得到的意义，让受众在观看一个普通人的奋斗、一处乡村的变迁、一项政策的落地中，自行抵达理论的内核，成为新形势下理论掌握群众的创新工具。这种对受众规律的尊重，是理论掌握群众方式方法的创新，也有效破解了理论传播“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等难题。

短视频平台成为互联网流量最集中、用户黏性最强、情绪传导最快的场域，其意识形态属性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个战场上，真善美的内容不去占领，杂音噪音就会填充；主流价值不去建构，解构性的叙事就会先行。短视频的算法推荐机制、情绪放大效应和圈层传播特征，更使它成为凝聚共识的增量。能不能建好、管好、用好短视频这个新兴阵地，直接关系意识形态安全大局，关系能否牢牢掌握网络舆论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把严谨的理论转化为优质视听内容。用短视频做好理论的阐释解读，不能满足于截取金句、罗列概念，而应坚持“小切口、深开掘、成体系”，善于用一条视频讲清一个概念，一组视频讲透一个原理，一个专题呈现一条逻辑链，以可视化手段把概念的来龙去脉、命题的内在关系、理论的实践指向讲明白。关键要能够抓住事物根本，把是什么讲准，正确使用规范表述，防止随意发挥；把为什么讲透，阐明重要论断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怎么办讲实，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可理解和参与的行动图景。

生动形象展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鲜活成就。所谓鲜活，就是要有现场、有细节、有温度、有说服力。短视频现场感强、代入感强，能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场景，把发展成就转化为生动画面，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活体验。短视频在传播创新理论时，要善于通过人物访谈、现场纪实、数据动画、今昔对比等多种方式，立体展现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历史性成就，让人在看得见的变化中理解背后的道理。坚持真实性与思想性相统一，讲成就真实、朴实，有一说一，不夸大其词，不摆拍造势，更不能以精致画面遮蔽发展中的问题，切实以真情实感增进受众对理论的认同。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精神底色。短视频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全面展现中国人民在中国精神指引下创造的奇迹。把镜头对准人民，以鲜活故事承载主流价值，以凡人微光诠释初心使命，传播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基层干部、人民子弟兵等的感人事迹，展现脱贫攻坚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崭新探索，推动这一成果的跨文化传播和共享，短视频大有可为。要善于用影像语言讲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讲清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注重讲道理而不是喊口号，讲制度逻辑而不是做简单比附，讲文明根基而不是宣扬文明优越。坚持既不回避发展中的问题，也不迎合偏见与误读；既讲清中国做了什么，更讲清中国为什么这样做。着力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短视频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从被看见走向被理解，理应成为国际传播的轻骑兵。

全面激活短视频的理论传播效能。把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贯穿选题策划、脚本撰写、拍摄制作、审核发布、算法分发、互动评论的每一个环节，建立健全选题把关、内容审核、舆情研判、纠错反馈机制，坚决杜绝断章取义、娱乐化调侃和“低级红”、“高级黑”。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推荐算法的价值取向，推动主流优质内容获得应有流量，防止流量逻辑凌驾于价值逻辑之上。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既防止一管就死，也避免一放就乱，在守正与创新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强化人才支撑，锻造高素质创作队伍。理论短视频创作对人的素养要求高，既要有理论功底，又要有传播本领；既要有政治敏锐性，又要有艺术感觉。推动“理论家+媒体人+技术人”协同创作，从理论工作者中培养镜头感，使之能够把学术语言转化为传播语言，同时不丢失理论的逻辑筋骨；从媒体创作者中培养理论性，使之能够辨识理论的层次和边界，避免以修辞替代论证、以情绪替代说理；从青年群体中发掘既熟悉平台又具有理论热情的连接者，让传播者本身成为理论与受众间的桥梁。锻造一支懂理论、懂网络、懂青年的“播火者”队伍，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推动创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火热实践中捕捉素材、提炼主题。

深化规律探索，推进理论传播提质增效。把短视频理论传播当作一门学问来琢磨。研究注意力规律，弄清什么内容能在前三秒抓住人；研究情感共鸣规律，弄清什么样的叙事能让人愿意看完并转发；研究算法分发规律，弄清优质内容如何在推荐机制中获得应有的可见度；研究互动转化规律，弄清线上认同如何转化为线下实践。加快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理论传播的效果，不能简化为播放量、点赞数，更不能被流量牵着鼻子走。既要看到达率、完播率、互动率，更要看受众是否真懂真信，是否内化为价值认同、外化为实际行动。

理论传播征文选登